

牙山深处的烽火兵工记忆

□林新忠 李渲

牙山，这座耸立于胶东屋脊的天然屏障，以它那雄浑的身姿、不屈的性格挺起了栖霞的脊梁。牙山之阴分娩出无数条沟壑，在大山的褶皱里，起起伏伏，曲曲折折，向远处延伸。千百年来，牙山以其丰腴的汁水和肥沃的土壤庇佑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善良的人们。

1941年春天，许世友将军带领的清河独立团直捣牙山，赶走国民党投降派，开辟了牙山革命根据地。从此，这里便成为胶东党和人民军队抗击日寇、开展革命活动的大后方。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支操着不同口音、扛着锤头斧头的特殊队伍，一头扎进了这片沟沟岭岭，开启了为胶东抗战铸造利剑的艰难历程。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待就是9年。9年里，这里造出的地雷、手榴弹、机枪、大炮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为胶东乃至全国抗战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受访者：
胡绍范，男，90岁，栖霞市桃村镇李老铺村人，曾任村会计。
胡树珍，男，93岁，栖霞市桃村镇李老铺村人，栖霞市民政局退休干部。

瓦屋沟，从瓦屋村起始，绵延十余华里，串联起十个村庄。从沟口往里走，起初地势平缓，越往上越陡峭，等到了沟的尽头突然开阔了，冒出一个“小肚”，一排排新旧不一的房屋顺着陡坡，错落拥挤地向上排布开去。这便是李老铺。李老铺村子不大，不足百户，村中央的一条主街将村子分为街南和街北。胡绍范的家，就在街北的半山腰。1941年3月，兵工四厂在此安家时，胡绍范刚刚8岁。如今90岁高龄的他依旧头脑清晰、思路敏捷，80多年前的往事说起来如在眼前：“我父亲是党员、村干部，后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兵工厂一来，父亲忙得脚不沾地。平时他不多说，我也不敢多问。村里突然来了这么多人，一下子热闹起来。小孩子好奇心重，总想凑上去看看个究竟。虽说不让外人进，可小孩子还是会偷偷摸摸地跑去瞅。”

最初的时候，兵工厂主要制造地雷和手榴弹。胡绍范家西侧的胡同是胡金章家的房子，兵工厂的翻砂车间就设在这里。当初胡金章是村里的富户，前后两院共18间房子，弟兄二人各住两排正房，最前面的6间南厅被腾给了兵工厂。门前开阔，专设一口大锅熔化生铁，浇铸地雷和手榴弹外壳。胡绍范印象最深的是一口特大风匣——是平时家里风匣的三四倍大，四五个人合力才能拉动。众人轮班，这班累了那班上，喊着号子齐发力。炉火映着汗水，号子震天，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翻砂工序在屋内进行，铁水注入砂模，便成了手榴弹皮、地雷皮。

村东头河南岸胡士珍家的三间闲房被划为弹药车间，专门用于制药、装药。村西头的河边有一盘碾，兵工厂用来碾药。管碾的是位身材高大又健壮的女人，人称“王大汉子”。有一头毛驴专门拉碾，“王大汉子”负责把压好的木炭、硫磺等过筛筛出细粉，再把粗粒倒到碾上继续碾磨。

木工班设在胡来珍家东侧过道洞里，旁边一间闲房堆放杂物。说是车间，实则只有一间房、一个人、一台脚踏铣床，主要任务是旋手榴弹柄。木料大多是从村民家中收购的。手榴弹把用料随意，松木、柞木及各类杂木均可。核桃木珍贵，专做枪托。梧桐木木质松软，可用来做药。收购木料时，其他木材只要树干，不要枝条，梧桐则树干、枝条全收。胡绍范常住木工班跑，一来二去熟练了，木匠还给他旋了一个小玩具。

兵工厂初来时，工人都分散住在村民家中，这三个，那家两个，几乎家家都有。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好转，兵工四厂和兵工二厂合并，兵工厂逐步向外搬迁，陆续迁到河东、河西、三条箭（现在的牙东村）等村。但李老铺相对安全，不少领导、技术人员的家属仍留居此处。1944年前后，兵工厂厂长王寿喜就住在胡绍范家里。胡绍范回忆说：“我家有五间房子。我们一家七口住西三间，东两间归王寿喜一家。王寿喜身材魁梧，四方大脸，身高一米七八。他平时很少在家，倒是他妻子、孩子，我们天天见。他妻子姓邹，平时没事就与我祖母、母亲一起聊天。他们有两个孩子，小儿子乳名叫路中，与我年纪相当，我俩常在一起玩。”

“村里还住了很多人，只是我接触不多，没太多印象。”胡绍范记得，村东住着一位王姓技术员，他妻子姓邢，岳母也随其居住。后来其岳母病逝，埋在了李老铺。

94岁的退休干部胡树珍，1948年在李老铺参军，转业后回栖霞，先后任职于工商局、民政局。他回忆，当年他们家与二叔家同住三间房子，爷爷奶奶随二叔生活，兵工厂的一位女工认了奶奶做干妈。同院南厅住着三爷爷胡德庆，他当过兵，后来负伤回乡，三奶奶早逝，他独自生活。家中还住了一位工人的家属，江苏人，带着一个小男孩，胡树珍常跑去找小男孩玩耍。

还有一名工人，胡树珍至今印象深刻。这人住在胡绍贤家里，20岁出头，外号叫“二活宝”，风趣幽默，爱讲笑话逗小孩子玩，身边总围着一圈小孩。胡绍贤家门口拴着一头牛，“二活宝”出门就逗牛，有时牛闭眼睡着了，他能一直把牛逗醒。

这些童年的往事，成了胡树珍与伙伴们一生的珍贵回忆。

1941至1942年，是胶东兵工厂最艰难的时期。日寇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频繁袭扰，让兵工厂举步维艰。

瓦屋沟的兵工厂，成了敌人的眼中钉，屡遭“扫荡”。好在兵工厂总能提前得到消息，把设备、物资都埋藏起来，把工人疏散到安全的地方。村里由民兵站岗，一发现敌情，立刻通知村民上山躲藏。家家户户都在山上挖了洞，白天分散开躲在树丛里，晚上一家人或几家人就躲进洞里。其实也算不上是洞，就是在半山腰，顺着地势挖一个豁口，前后左右用木棒搭成架子，上面盖上草或树枝，再覆上一层土，洞口用树木或秸秆遮挡。洞内铺上千草、麦秆，能睡五六个人。为防止鬼子抢掠，村民把能带的都带到了洞里，粮食、衣服、被子、锅碗瓢盆甚至家禽牲畜也都上了山。

在胡绍范的记忆里，日寇曾两次进犯李老铺。第一次是1942年冬。满山柞树叶泛红，庄稼也都收割完毕。日伪军从沟头的瓦屋村向上行进，一路没有停留，穿过李老铺，顺着榆林沟上了山顶，然后沿着山顶向西去了清香窑和老庙沟。这次是路过，没有大肆破坏，却枪杀了一个11岁的女孩——“伞儿”，胡金锡的大女儿。她躲在树下，见远处有人上了山，误以为是八路军，起身张望，刚一站起身子就被日寇一枪击中，不幸身亡。

鬼子第二次进李老铺，目标直指兵工厂。那是1943年春的一天，天还未亮，鬼子越过清香窑和圈里两村，翻山从李老铺的北口子突入村内。

此前村里早已得到了敌人“扫荡”的消息，可一连几天不见鬼子的动静，天又冷，站岗放哨的民兵也渐渐松懈。五更天时，一个民兵出来方便，发现鬼子正向村里摸去，便扔了一个手榴弹。住在村里的人听到动静急忙往山上逃，洞内的人也分散开躲了起来。

鬼子进村后，没找到一个人，就在村子里住下。胡树珍的三爷爷胡德庆当过兵，胆大，趁天还不亮，偷偷回了村，从后窗爬进屋内拿东西，不幸被鬼子发现。鬼子把他绑在村里的一棵大槐树上，逼他说出兵工厂的设备埋在哪里。胡德庆宁死不屈，未吐一字。最后鬼子把他扔进火堆，压上一块大木头，活活烧死了。后来胡德庆被迫认为革命烈士，名字刻在英灵山烈士陵园的烈士塔上。

天亮后，鬼子把村里的房子点上火，随后撤离。山上的人们看到鬼子走远，哭喊着冲回村里，眼前已是一片火海。人们开始不顾一切地救火，可杯水车薪，救下来的寥寥无几。胡松珍从山上跑回家时，5间房子正燃着熊熊大火，在众人的帮助下好歹救下了两间，就这么住了下来，勉强避风挡雨。

胡绍范家的房子很幸运地没被纵火，可进门一看，屋内被翻得乱七八糟，两个后窗不翼而飞，空留两个大窟窿，呼呼地透着风。原来，两扇后窗被鬼子拆下来当柴火烧了。

相较之下，胡松珍家和胡绍范家还算幸运的。这一次鬼子“扫荡”，全村共烧毁房屋66间，一半以上的人家无家可归。有的在烧毁的房子旁边搭个棚子，有的干脆就住在山上挖的窝棚里，还有的借住在亲戚朋友家。

李老铺遭受了这么大的苦难，却没有一个人埋怨兵工厂，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倾尽全力支持兵工厂。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支持兵工厂，才能生产出更多的武器，早日赶走日本侵略者。

1944年前后，抗战形势好转，兵工厂便逐步搬到了交通条件相对较好的元庄、三条箭等村。此时，兵工厂的工人多达千人，这么多人的衣食住行需求量很大，大多都需要村子的支持帮助。村里养驴养骡子的人家纷纷出工出力为兵工厂运送粮食、炮弹、衣服。虽然兵工厂已撤离李老铺，可李老铺村民依然争着抢着去给兵工厂帮忙。

胡绍范的父亲是村党支部书记，平时工作繁忙，没有时

间参与打差（即短期帮工）。“有一次区里安排村里从烟台往兵工厂运高粱和玉米，这下可把父亲难坏了。看他急得团团转，我就说：‘爸，不行我替你去？’父亲瞅我一眼：‘小孩子丫丫，一边去！’”胡绍范回忆道，“我跟他说：‘爸，你让我试试，不行再说。’”虽然胡绍范从小身体就壮实，可他毕竟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像大人一样赶着骡子走南闯北，他就不顶用了，抬驮子抬不上，绑驮子不会绑，父亲的顾虑也是有道理的。

胡绍范以为没戏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已经给他绑好了驮子。怕他路上累了哭鼻子，父亲还把驮子绑在两边，中间留出一个地方，等他走不动了好骑上骡子歇一歇。等上了路，胡绍范和大人一样，不但没坐骡子，还一路跑得颠颠的，什么事也没落在后面。就这样，五天跑了两趟烟台，胡绍范都撑了下来。父亲一看，这小子行呀！后面有打差的事，他便都交给了儿子。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可少年时的那段经历，胡绍范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从犏头往回运木板，从麻地往新庄运炮弹，从郁都往回运皮袄，从臧家庄、大辛店、福山往回运玉米、运高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从大辛店运粮。几十个人的队伍，仅李老铺村就去了八九个人。那天出发前，每人只准备了3天的干粮，牲口也只准备了3天的料，没想到路上出了点意外，耽误了一些时间，到第3天人畜断粮，队伍却还在半路上。走到臧家庄实在走不动了，大家提议去栖霞县政府驻地马陵冢求助。赶到那里后，伙房把剩下的一大筐馒头全搬了出来，几十个人把这些馒头一扫而空。

当年，兵工厂为了应付鬼子“扫荡”，把机器设备和造好的地雷、手榴弹等埋到地里、河里。因为埋的地方太多，后来有许多东西找不到了。胡树珍讲述了发生在李老铺的两个故事。

一件事发生在1942年。一天，胡树珍的叔叔胡金海想在自家场园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开一个菜园，刨着刨着刨出了一个木头箱，打开一看，是一大箱子手榴弹。后来，他通过村里把手榴弹交还给了兵工厂。

另一件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故事。有一年夏天洪水过后，几个小孩子在河滩上发现了一个60式炮弹。三个人好奇，就找来锤子、剪刀、钉子，想将其拆开卖废铁。一不小心，炮弹爆炸，三个孩子全部重伤，有的被炸断了腿，有的被炸断了胳膊，还有一个肚子被炸了一个洞。经过医生的抢救，他们都保住了性命，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兵工厂到来后，李老铺村的不少进步青年纷纷投身到这支革命队伍中来。胡树珍的姐姐胡淑美便是其中之一。1946年，胡淑美进入兵工厂，在三条箭（现牙东村）组装手榴弹和地雷。有一年，胡淑美把工厂发的一双“力士”鞋送给胡树珍，胡树珍一直舍不得穿，直到过年才穿上，小伙伴们羡慕不已。两年后，胡树珍也穿上军装，投入到了解放战争的滚滚洪流中去。



村后的山为当时的村民提供了躲藏的地点。



兵工厂旧址。



李老铺全貌。



山海寻梦，前路迢迢。在福山，曾有一位有谋略、有作为、有品行的共产党员。他在创业中敢于打破天花板，走古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他围绕“大黄河”牌饲料的开发，深加工、增效益，创名牌、扬声誉，一步一奋进，一年一成就，将一生的心血倾注于水貂饲料与良种繁育的技术开发上，被称为国家星火计划的带头人。他就是于培岐同志。

立业

于培岐同志足智多谋，工作中善动脑、多思考，总比别人“多看一着棋”。1974年，他被任命为福山县臧家公社“战山河专业连”连长，主战场设在城北的沙沙旺。这里风沙肆虐，一片荒芜，树叶、杂草覆盖沙滩。于培岐同志看到这里的状况后，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建一座饲料加工厂。他打算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加工颗粒饲料，这样既可以清除杂草，又可以变废为宝，增加村民的收入。他将自己的想法向公社党委、政府作了详细的汇报，得到了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战山河专业连”实行两线作战：一线开发后沙旺，一线创办加工厂。于培岐挺身担当厂长一职，带领30余人迅速投入到颗粒厂的筹建中。从土木建筑到设备购置再到安装调试，一切从零开始，困难重重。干部职工不以事艰而不为，不以任重而退缩，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拼搏精神，越是陡坡越攀登。历时半年的打拼，一座占地1.99万平方米，拥有23台套机械设备、61名职工的颗粒饲料加工厂，很快便屹立在后沙旺。加工厂利用厚积如被的槐树叶以及漫山遍野的熟草蔓、地瓜蔓、花生蔓等，加工植物饲料，年产量500多吨，全部出口日本，年产值达到150万元，为乡镇企业发展捞得了第一桶金。

兴业

1984年，在改革开放浪潮的推动下，福山颗粒饲料厂敞开大门，走出去联合、请进来抱团，与山东省外贸土畜产公司、烟台外贸土畜产公司联合，成立烟台升华联合有限公司，同时，公司成立党组织，于培岐任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总公司踏上时代的新起点，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断地向新跃升、向优迈进、向高攀登。

经过多年市场交易的洗礼，于培岐逐步意识到，当下的市场，品牌主宰乾坤。谁得品牌，谁就得市场。企业要行得稳、走得远，就必须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的品牌。于是，他果断制定品牌战略，并亲自挂帅，和职工一起流汗、一起打拼。工厂设备更新换代、提档升级，加工材料精挑细选、严格标准，操作工艺突破传统、守正创新。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生产出市场上独树一帜的供水貂食用的有机颗粒饲料，产品定名为“大黄河”。经省市有关部门的检验检测，“大黄河”饲料的各项指标均达到国际水平，在全国17个省市、20余万只水貂历时三年的试喂中，获得良好的信誉，在国家质检总局（现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成功注册企业商标。

很快，“大黄河”饲料的名声远播国内外，具有很强的溢价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实践证明，使用“大黄河”喂养水貂，比使用鲜性饲料可降低15%的成本，并且产出的貂皮尺码大、质量优，产仔率高、疾病少。到1988年，“大黄河”产品既有圆粒形又有柱粒形，年产量达到2万吨，全部出口国外。为满足不同国家、不同种类、不同养殖期的多元需要，公司还制定了16字生意经，就是“投其所好、供其所需、补其所短、应其所变”。企业生产迅速进入个性化、细分化、标准化的轨道。

强业

在拼搏的岁月里，烟台升华联合总公司思想再解放、视野再拓宽，从饲料加工到水貂养殖再到联结农户，一步一步地向前冲，一程一程地创新高。到1985年，总公司新建了电焊网厂、珍贵毛皮动物饲养场，组建了仓储部、运输部、技术培训部等部门。他们从加拿大、美国、日本、德国、挪威、俄罗斯等国家引进水貂、蓝狐、彩狐等珍贵动物600余只，建立起良种繁殖试验场。总经理于培岐牵头成立良种繁育研发小组，对水貂的生长生育期特别是繁殖期昼夜关注。于培岐披星戴月地守在笼子前，细心观察、潜心研究、探索规律、总结经验，推动良种繁殖场不断上水平、上档次，每年可繁殖1万多只优良品种，可供应上百家养殖户，形成公司+农户+服务的产业链条。总公司顺势而为，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推动各环节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坚持实行六个统一：种源统一提供、饲料统一供给、设备统一安排、技术统一培训、疫情统一防治、价格统一制定，毛皮质量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美国同类产品的水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市场毛皮价格趋于稳定，国内一张优质水貂毛皮的价格可达200—400元，而养殖成本约50—100元，利润空间较大，发展前景看好。

一生创业梦，半世饲料缘。于培岐这位农民企业家，一生专注一件事，那就是对水貂产业的深耕细作。他主持完成的水貂饲料加工及良种繁育技术开发课题，1982年获国家经贸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89年获国家星火计划四等奖；他主持完成的有机颗粒饲料技术开发，荣获国家专利、“七五”全国星火计划成果奖金奖等。1986年，他被评为“七五”全国星火计划优秀企业家，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于培岐与水貂的故事

□赵培策